

顾廷龙与《章氏弟子录》

■张维明

1932年，章太炎先生在上海寓所手订《弟子录》。

这一消息传到北平，引起了章师东京讲学时的弟子、时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钱玄同的关注。于是他想方设法一探究竟，并在自己的日记中留下了《章氏弟子录》的主要内容及有关信息，其中包括这份名录的来历。

《钱玄同日记（整理本）》（杨天石主编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4年）1933年1月2日记述：

十一时回府，十二日约建功雅于东华春。他示我以潘△△致顾[残]。因我托顾探老夫子自开之弟[残]廿二人，十九生，三死。如左：

黄侃 蕲州、吴承仕 歙……

日记中讲，当天11点回家，中午12时（记文中写作“日”）约魏建功在“东华”雅聚。他给我看了“潘君”致“顾君”的信件。因为我曾托“顾君”打探老夫子（指太炎先生）自订的《弟子录》，共22人，其中3位已经过世。

显然，在钱玄同探悉《弟子录》的过程中，“顾君”是位关键人物，他应该与魏建功、钱玄同、潘君、章太炎都有关联。“潘君”则是《弟子录》内容的直接提供者。只是写日记时，作者有意隐

去了他俩的名字，所以旁人读来颇费猜度。其实，这位“顾君”便是当年燕京大学国文专业硕士研究生、日后成为上海图书馆馆长的顾廷龙先生。

顾廷龙（1904—1998），字起潜，吴县（今江苏省苏州市）人。早年从外祖王同愈习文字训诂之学，后入上海南洋、国民、持志大学。1931年7月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，得到容庚、魏建功、闻宥、郭绍虞、黎锦熙诸师的指导。其中容、魏两人还是钱玄同执教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时的学生。

后来顾先生回忆撰写学位论文《说文废字废义考》和答辩的情况：“当时按规定，若一年之中可以完成论文，就能毕业。我在一年中作完论文之后，黎锦熙将我的论文交给钱玄同看。钱提了一些意见，诸如解释欠妥、论述不清等问题，约二十条左右，我就按照钱的意见作了修改……答辩会结束，我的论文算是通过了。”（沈津编著《顾廷龙年谱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）

毕业典礼结束后，顾廷龙陪同在典礼上发表演讲的胡适，一起前往族侄顾颉刚（时任燕大历史学系教授）在蒋家胡同的寓所。这一天应邀前来参加聚会的

客人，还有钱玄同、容庚、黄子通、洪业（煨莲）等燕大同仁和有关专家学者。

所以说，钱玄同与“顾君”不但认识，而且还是其业师的导师，托学生的学生办事也在情理之中。而这位寄来名录的“潘君”，则是“顾君”的妻弟——潘承弼。他是章先生新收的弟子，也名列这份《弟子录》中。

潘承弼（1907—2003），字良甫，号景郑，别署寄沓，吴县（今江苏省苏州市）人。出身名门望族，家有宝山楼，积六代收藏，藏书30万卷，尤多善本佳槧，为士林所注目。他早年就习文字之学。1931年，由太炎先生的义弟、前署国务总理李根源推荐并亲自陪同，赴沪正式拜章先生为师。次年7月6日，太炎先生致书潘景郑：

北京大学受东人迫胁，令姊丈顾君想已南来，汇刻古文尚书之举，究竟有端绪否？仆自得三体残石及释文残卷后，亦颇欲穷问斯事……顾君如已南来，即欲与之一叙，望足下为介绍也。（《章太炎先生遗札未刻稿·第二札》，载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82年第四期）

信中所说的“姊丈顾君”就是指顾廷龙。当时章先生治《书》又有心得，先后撰写《太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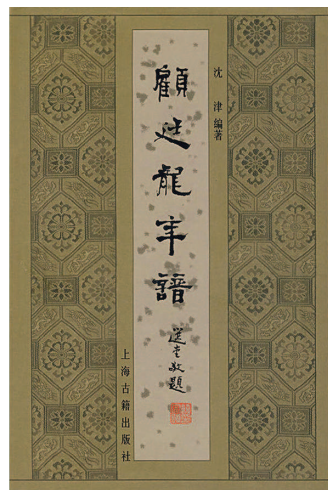
公古文尚书说》一卷和《古文尚书拾遗》二卷。“顾君”则在燕大学习期间正着手收集和和研究各种版本的《尚书》文字，这项工作引起了章先生的关注，希望见面叙谈。

50多年后，顾廷龙在《章太炎先生篆书墨迹序》（《顾廷龙文集》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，2002年）中还提起这件事：

先生晚年，侨居吴门，设帐讲学，时余方负篋燕京，不获厕门墙之列。一九三二年夏暑期归里，始由弟潘景郑之介，晋謁于锦帆路寓邸。因余方治隶古定《尚书》之学，先生为言薛季宣隶古定《尚书》大致与《经典释文》旧本相应。盖开宝后儒者辑录释文未改本为之，亦有采说文诸书者，不尽依东晋本也。此说后著于《古文尚书拾遗定本》中。娓娓讲述，半日而不倦。

不过，这时章先生虽然已在苏州购置侍其巷内一座花园宅第，但因夫人汤国梨嫌其周边环境嘈杂，所以还寓居上海，直到两年后的秋天才迁居苏城锦帆路“章园”。此前他来苏州，无论是访友还是讲学，一般都下榻李根源的寓邸——葑门内十全街“曲石精庐”。所以，他们的会面地点很可能是在李府。

不久，顾廷龙即应燕京大学



▲《顾廷龙年谱》

图书馆馆长洪业的邀请，回校在图书馆从事采购古籍的工作。于是才有了钱玄同请他探询名录的一段故事。

正是由于顾廷龙的特殊人际关系，才使这份《章氏弟子录》的内容通过钱玄同的日记保存了下来。尽管页面上的名录已有涂改缺损，部分内容还经过移易改编，不过我们还能根据已故太炎弟子王心若先生珍藏的《余杭章太炎先生弟子录》（1932年3月增订本），恢复这份初刊本名录的原样。

潘景郑先生晚年，在得知同门心若先生历经劫难保存《章氏弟子录》的消息后感慨万千，还特意询问笔者“是哪一年的《弟子录》”，并讲述了他所了解的有关《弟子录》的往事。如今回忆，不禁执笔泫然。

（上接第一版）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中共中央宣传部派员到上海征集有关革命史料，他们在许多地方空手而归，却在合众图书馆觅得一大批珍贵资料，其中有1921年版《列宁全书》第一种《劳农会之建设》、1926年版《中国农民运动近况》、1927年版刘少奇著《工会经济问题》《工会基本组织》等百余种。中宣部的同志在惊奇之余，赞不绝口地夸顾先生他们“真有远见”，赞“合众”收集革命书刊的品种与数量在国内外首屈一指。他们尤为感谢顾先生收藏了由陈望道翻译的、1920年8月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也就是今年马克思200周年诞辰时许多报刊刊载的、在德国特利

尔市展出的那本封面误为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珍宝。

不怕吃苦 严谨的治学之道

《大辞海》词条中称顾廷龙为古籍版本目录学家。这项工作其实是为他人攀登科学高峰铺路搭桥。正如顾先生常说的：“编书目是项很辛苦的工作，同其他为读者服务的工作一样，有如庖丁烹调盛宴，为主人享客，自己则不得染指，因而怕吃苦者远之，逐名利者避之，更有视其为雕虫小技而讥之。”可是，顾先生心怀坦荡地致力于历史文献的收集与整理，从事别人远之、避之、讥之的版本学，而且取得了很多成果。他不赞成自我表现，认为编制书目对文献的保存与利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这一点，我在跟随他时深有体会。书籍浩如烟海，到哪里去找？拿来顾先生的书目，犹如看到路标，一目了然。热爱自己的专业是在专业上出成果的最好动力。

在收集整理历史文献的过程中，顾廷龙一直有“变孤本不孤”的强烈愿望。孤本在同一时间只能供个别人阅读，影响知识的传播和应用。顾先生的“变孤本不孤”有两层意思：一是在找不到更多版本时姑且称其为孤本，但有志者还应当出井观天，不断发掘，让“孤本不孤”；第二层意思是影印、复制孤本。这在今天似乎易如反掌，可在顾先生生活的那个年代是难乎其难的。没钱影印，顾先生就用手抄。他说，为了“变孤本不孤”，为了“存亡续绝”，他熬一夜可抄写3000小楷。顾先生本不是书法家，书法家是他抄写孤本的副产品，是



▲顾廷龙故居的堂楼与大厅间有一座完整的砖雕门楼，上面是“四朝元老”潘世恩题写的字牌“恭俭庄敬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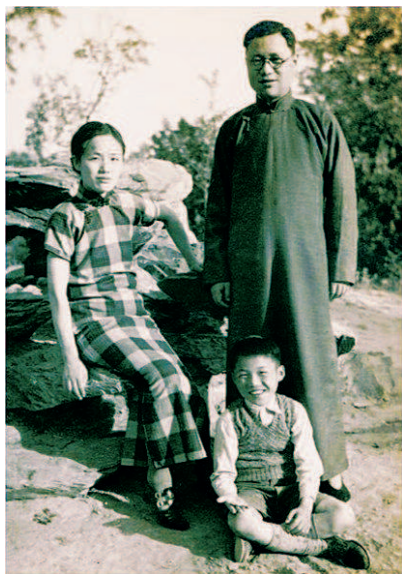
他鉴别古籍的意外收获。

1955年秋，上海市文化局电话告知顾廷龙，上海造纸工业原料联购处从浙江遂安县收购了一批约200担左右的废纸送造纸厂做纸浆，其中或许有线装书。顾先生连夜奔赴现场察看，发现“废”中藏“宝”，翌日即率人前往翻检。工作现场是纸屑飞扬的垃圾堆，他们不顾尘垢满面，汗流浃背，一大包接一大包地解捆，逐纸逐页地翻阅，片纸只字，只要有资料价值，绝不轻易放过。经过连续11天的劳作，一大批珍贵历史文献被抢救出来。从内容上说，有史书、家谱、方志、小说、笔记、医书、民用便览、阴阳卜筮、八股文、账簿、契券、告示等；就版本而言，有传世孤本明万历

十九年刻《三峡通志》、流传稀少的明本《国史纪闻》《城守验方》、明末版画上品《山水争奇》，还有不少旧抄的稿本。

家谱之所以能成为上海图书馆的收藏专门，与顾先生这次在废纸堆中披沙拣金是分不开的。他这次发现的大量有关经济、教育、风俗等史料，绝非从正史中能找到，也不是花钱可随便买到的。有了这段从废纸堆中抢救历史文献的经历，便有了上升为公理的条件。顾廷龙当即在报上撰文，呼吁各地教育机关必须关心当地图书文物情况，向群众进行广泛宣传，以杜绝珍贵文献被弃为废纸的现象再次发生。

不吝付出，方能杰出。顾廷龙先生的杰出，正是因为他有毕生的付出。



▲顾廷龙一家在民国时的合影。